

爱泼斯坦来电

丁言昭

1985年春节前几天,我家电话铃响了,我赶紧去接电话,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中音带磁性的声音:“您好,这是丁景唐先生家吗?”“是,您哪位?”“我找了景唐先生,在吗?”我听着觉得好像是个外国人在说中文,不过吐字还算标准。

“在的,您稍等。”我还没有放下电话,我父亲丁景唐已把听筒拿了过去,原来他听到电话铃响,又听到电话里传来的声音,就跑了过来。“你好,爱泼斯坦同志。”

啊,是爱泼斯坦!宋庆龄的秘书,一位了不起的国际友人。他怎么会找我父亲的?噢,我想起来了,前一阵,父亲和爱泼斯坦会晤过,他曾托父亲几件事。

父亲在电话里和爱泼斯坦谈了半天,也许父亲的宁波普通话,对方听不太懂,但是我可听清楚了。“老三,你来和他说说吧。”

爱泼斯坦请我父亲帮忙找找董健吾,人称董牧师,与宋庆龄有联系。当时爱泼斯坦正在写宋庆龄传,需要这方面的材料。1936年董牧师曾以“王牧师”名义帮助斯诺去保安。父亲要我告诉爱泼斯坦,董健吾已找到,还说董的女儿董慧芳曾是宋庆龄的小交通,她口述,由别人记录的《我和“二阿姨”》已出版,“二阿姨”指的是宋庆龄,他说会请少年儿童出版社赠送给爱泼斯坦。我的大表哥陈彦方,初中在上海志农中学(现已拆除),他说董慧芳是他的中学英文老师,他觉得她为人很好,是他心目中一位亲切可敬的师长。大表哥长大后,成为临床心理医生,为中国人民服务也从事医学外事活动,尤其是在精神障碍的分类与诊断标准方面及生物精神病学方面,常常与外国同行交流,英文可棒了,这与他从小受董老师的教导是分不开的。



为了帮助爱泼斯坦顺利写好宋庆龄传,父亲还替他复印了陈赓将军的日记片段,1949年6月6日、8日的日记,是从1982年8月战士出版社出版的《陈赓日记》中寻找到的。要我告诉爱泼斯坦:春节后寄给他。

父亲的正事谈完,我马上想向爱泼斯坦请教英语,因为那时我正在准备到日本去参加一个比较文学研讨会,必须用英语宣读论文。我改口说英语,说“My English is very poor.”(我的英语不行)

谁知,爱泼斯坦用中文回答道:“不错,说得很好!”“Can you help me?”(你能帮助我吗?)“当然可以,不过,你的语音很不错。”他还是不说英语,用中文回答我,这一下把我弄得没辙了,父亲一直站在旁边听着,说,“这个电话够长了,别妨碍他的时间了。”我只得挂断了电话。

1985年2月20日是年初一,父亲给爱泼斯坦写了一封信,信的头上写了一句:“留言言昭处参考。”在信尾加了一句:“又,我的三女丁言昭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生。她在电话中学说英语,说得不好。她向您请安,希望下次来沪当面向您请教。”可是后来他来上海时,我再也没有见到他。这封信是父亲另外抄了一份,特地留给我的。

可是爱泼斯坦的事我可知道得多了,他孩提时随波兰籍的父母到中国,20世纪30年代,他结识了斯诺,1938年,他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总部工作,1944年,他随中外记者团访问了延安和晋绥抗日根据地……1957年爱泼斯坦加入中国国籍,在他的蓝眼睛里中国变得更加可亲,中文似乎成为他的母语了,怪不得他老是和我说中文,我现在非常理解他——祖籍波兰的中国人——爱泼斯坦同志!



边看边聊

去年底,我和爱人住了一家养老机构。一进门,迎面看到“欢迎新同学”几个大字,再抬头一看,又见长廊边挂着一块“xx学院”的横幅。哈哈,主办方希望人们把这里当成一所“大学校”。

“养老学校”

过传忠

我们两个有着几十年教龄的养老者来说自然感到亲切,但总觉得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,一种精神的追求而已。

生活了大半年,看法改变了。这个养老机构,不仅形式上有不少教育色彩,如春秋两季都有开学典礼,每年教师节都安排一系列相关的活动,甚至组织成员去外地旅游也称为“研学”,而且更重要的是,在具体实践上,在日常的活动设置上,它确实具有鲜明的带有教育特色的追求。它虽然没有一般学校的专职教师、课程设置和系科、班级的安排,但它

有很多丰富多彩的讲座,除医疗保健之外,文科和理科都邀请不少专家学者以及各方面学有所长的人来讲,受到成员的欢迎。更能调动成员积极性的,是门类众多的专业兴趣小组,攒蛋、门球、乒乓、歌咏、舞蹈,这类文体活动自不待言,书法、绘画、钢琴、乐器这类带有一定技术、技巧性的小组也吸引了不少人;甚至还有数学、电脑方面的组织。此外,这里还有些规模较大的活动,如合唱《长征组歌》的演出,五六十位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在有关人员的指导与协助下,通过数十次的排练,把具有十个篇章的大型节目完整地呈现出来,这一成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,也体现了“老有所为”的精神。

这些每天接触的状况,使我联想到与教育有

关的两个词语——

一是“有教无类”。这里不分高低贵贱,人人都是学生,都可以吸取知识,提高能力。由于成员的特殊状况,也为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,可以为每个成员作有针对性又是宽松活泼的服务。这是一般正规学校不可能办到的,许多成员已经爱上了这样的生活。当然,今后的发展还有更多有待探讨的空间。

二是“能者为师”。除了邀请一些专家来开设讲座,这里绝大部分的教学任务都是由成员们自己承担的。人住这里的真是人才济济,各行各业,各种学科和门类,层出不穷。而且,他们都已退休,有较多的空间,也有更多了解社会充实自己的愿望。这样,相互学习,各显神通,能者为师的状况不仅大大降低了教育的成本,也为成员们的老年生活提供了有活力有价值的内容,这也是一般学校



喜庆双节(剪纸) 奚小琴作

所不具备的特色。最后,要涉及一个理念:养老机构究竟是干什么的?这首先要对老年有正确的理解。老年是人生一个阶段,如同婴幼儿、青少年、成年一样,是一种正常的生活。是的,老年阶段的健康状况是会有所退化,但不是人人都会患病,而有些“病”是不涉及生命,是可以“延年”的。因此,把养老只看成“养病”,甚至夸张为“等死”是不对的。养老机构当然要

维护成员的健康,但它不是医院,它要保证成员的正常生活,而学习正是老年人应有的生活内容。当然,养老机构也不等同于一般的学校,它通过学习来丰富成员的生活,而不必实行一般学校的规章制度。

总之,在养老机构,应当“老有所养,老有所乐,老有所学”,甚至“老有所为”,应当把它办成老年人愉快度过最后阶段生活的“大学校”。

有一次在静安寺,我独自走夜路,对远远过来了三四位路人,刚下晚班的样子,有说有笑。近了,看到他们探路的盲杖,才发现是视障人士。虽然心理学知识告诉我,视觉缺失的人在黑暗中的联想非常强大,但我还是忍不住边走边回头,直到目送他们远去。一扭头……

这么一说,我才发现自己每天的生活,竟有那么多地地方,受益于包容性设计:

比如我和大家一样,睁开眼就划手机,而手机触摸屏技术,最早是由有手部疾病的工程师为同他一样苦恼、按压键盘困难的人发明的;比如电动牙刷,是牙医伍格博士心疼那些行动不便、有关节

“背脊骨上长眼睛”

曲玉萍

教设计的陈老师听到这件糗事后,说:“其实每个人都能在特定场景下,出现暂时的身体障碍。”她举了几个例子:非常健康的女性,怀孕后会连弯腰系鞋带都难以完成;耳朵尖的人,到了嘈杂餐厅或轰隆作响的火车上,听力不比耳背老人好多少;脚意外骨折后,上一级台阶都堪比登天。

“所以我们最需要的,是包容性设计。”陈老师说,“也就是真正的好设计,它适用于所有人,弥补人类天生的不足。”说实话,和大多数人一样,之前我只听说过“无障碍设计”,而且想当然地认为,它的使用者是坐在轮椅上或者失明的人。

“那你总该听过上海话里的‘依背脊骨上长眼睛啊’,意思是人天生能力有限,管好自己得了,少管别人。而包容性设计,却偏偏和这句话反着来——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,所以去解决别人的困难,就是在造福自己。”经陈老师

这么一说,我才发现自己每天的生活,竟有那么多地地方,受益于包容性设计:比如我和大家一样,睁开眼就划手机,而手机触摸屏技术,最早是由有手部疾病的工程师为同他一样苦恼、按压键盘困难的人发明的;比如电动牙刷,是牙医伍格博士心疼那些行动不便、有关节炎、中风、神经症或长期住院的人,让他们不必转动手腕,也能保持口腔卫生。而现在,几乎所有“懒人”都在用;又比如感应门,其实古人早就幻想过它,像《西游记》里的妖精洞府,或是昆仑之巅的“天门开合”,但世界上第一扇真正实用的自动门,是两位门控专家,在大风天看到老人、拄拐杖者以及靠轮椅前行的人,费力推开重型大门,他们便想:“假如门可以自动打开,岂不是人人都能轻松进出?”

再比如游戏手柄,可能连天天用它打游戏的人也不知道,早期的手柄对肢体障碍者、手小或手指不灵活的人非常不友好,多按键操作要求非常高,很多人玩上一会儿,就觉得自己“笨死了”。终于,在人体工学专家、医疗康复师以及残障玩家的合作研发下,现有的游戏手柄,变成了“只要你想玩,任何人,无论怎样,都可以玩”,手指脚掌头部舌头眼睛甚至脑电波都能操纵——差的设计处处设障,让用的人以为是自己的错;而好的设计让一切变得简单,游戏回归本质,玩的人更自在更自信。

对了,还有无障碍通道,当初为伤残人士设置,如今所有人都在用:推婴儿车的、骑自行车的、拖行李箱的……说到行李箱,那是上世纪70年代,伯纳德·萨多先生看到妇女、老人以及身体不便的人拎着大行李箱寸步难行,才想到把有轮子的木板安到行李箱下面。当他拖来拖去时,遭到很多身强力壮者的嘲笑——可后来,连嘲笑他的人也用上了有轮行李箱!

从电影字幕到语音助手,从防滑地面到尼龙搭扣鞋,从摄像头到可穿戴设备,从感应龙头到自动驾驶汽车……如陈老师所说,真正好的创新,从来不会只为“少数人”服务,它对所有人友好,让我们“背脊骨上长眼睛”,不再羞于或缺憾,有信心帮助自己,更有能力共情他人。

日前,笔者路过南京路,那里如织的游人来自天南海北,但有个共同点,举起手机都在留影,在互联网的当下,人人都成了照相师了。在人们留影的同时,不晓得他们可知道,南京路是中国照相业的发祥地。

摄影技术最早传入中国的不是上海而是广东,时间在清道光二十六年(1846年)。传入上海大抵在19世纪50年代,至清同治十一年(1872年)时,上海已有多家照相馆并存。由葛元煦撰写并成书于清光绪二年(1876年)的《沪游杂记》第二卷中,就有“照相”的条目,他写道:“西人以药水玻璃夹入横木匣内,匣内嵌小凹镜,对人摄影于玻璃上,取出以沙水冲洗,即见人面。神气部位,无不肖。复以药水质就纸片,覆于玻璃上,微照日色,则面貌衣痕陈设物现出纸上。”葛氏又说:“近日华人得其传,购药水器具,开设照相楼,延及各省。”

葛元煦出版《沪游杂记》时,已在上海居住了15年,因此撰文具有较高的真实性。那葛氏所言的照相楼开设在哪里呢?查1906年至1907年的《时报》上刊登的照相馆广告,有耀华、致真馆、丽珠、颐园、日华、张园,大部分都在南京路上,没登广告的还有宝记、中华、兆芳等,也大多在南京路。除此外,只有

少数的几家照相馆在四马路、五马路及大名路。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出版的裴锡林著的《绘画游历上海杂记》记载:“照相之法,出自西人,传于上海。故照相之处上海独多……其店之最大者曰耀华、曰宝记、曰致真,不下十余家。”文中提到的耀华、宝记、致真馆都在南京路上,可以这样说,南京路见证了上海滩乃至中国照相馆的兴起与发展。

南京路为什么会成为照相业的发祥地,主要得益于两点,一是西风东渐,上海人勇于接受外来文化的登陆,这是观念上的开放。还有一点也重要,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,据史料记载,在清末至民国初,拍张照片是件大事,一张全身照要一两块大洋,如要放大着色一张24英寸的照片,则要12块大洋,这个价格在当时可买400斤大米,由此可见价格相当昂贵。所以,早期照相馆服务的对象,除了外侨,大多为达官显要、富商巨贾。还有一个群体,那就是名妓优伶,至今我们还能看到那个时代的烟花女子遗影,布景不是西湖十景就是亭台楼阁,还配有茶几、花瓶、高脚痰盂等道具。

今人对南京路的照相感知,主要来自两处,一是王开照相馆。这家中华老字号创建于1923年,业主王秋忠,广东人,他15岁到上海谋生,就是在南京路上的“耀华照相”学生意。后来,王秋忠自己在南京路上开店,取名为“王开照相馆”,意为王氏独自经营的照相馆。另一家是“冠龙照相器材商店”,它创办于1931年12月,这是中国人自己开的照相材料商店,摄影爱好者简称它为“冠龙”,它填补了我国照相材料行业的空白。值得一书的是,1949年后,国产第一架照相机——劳动牌照相机就诞生在“冠龙”。

站在南京路上回眸照相史

吴少华



去年退了市青联,今年刚退了市青年文联。这两个团体与我参加的其他团体不同,其他团体没有年龄限制,而这两个团体年龄到了是一定要离开的,这就意味着自己不再是青年队伍的一员了。

越是到了这个时候,小时候的记忆不知何故越是清晰。前两天在公园闲逛听几个小朋友唱歌,有些欢喜有些惆怅,于是想起自己那些年爱过的一些歌来。

我的小学生活是在团结路小学(今宝山实验小学)度过的。不记得音乐课老师的姓名了,印象里30多岁模样,一头齐耳的短发,脸有些方。她的儿子与我同年级,课间常在一起踢毽子,所以对这位老师我是有亲切感的。

她最初教我们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和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这一类歌曲,班里同学纵然知道要做接班人,却依然唱得松松垮垮,她眼睛一瞪,瞬间显出威严,说:“拿出力气来!”

到了四年级,她开始教我们《送别》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这一类歌曲。唱《送别》的时候是在教室里,翻到音乐课本那一页,她唱一句我们唱一句,待我们基本学会,能连起来像个样子了,她搬起一架黑黑沉沉的手风琴背在身前,边拉手风琴边带着我们一起合唱。她说这首歌的歌词是李叔同写的,可我们没人知道李叔同是谁,也不清楚“长亭外,古道边”什么意思,更不明白白了几十遍教会大家,为什么合唱的时候她要闭着眼睛拉琴,对于这一点同学们私下里偷偷笑过她。我唱这首歌是挺认真的,课前唱课后唱,上课的时候扯着嗓子唱,她听了皱皱眉头批评我:“这是伤感的歌,怎么能唱得这么响。”

记得那时爱过的歌

唐吉慧

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学习的过程同样是她教一句我们唱一句,不同的是这次在多功能教室里,因为多功能教室里有架钢琴。她做着手势

让大家准备合唱,她便弹起了钢琴,我瞥见她的十根手指灵活得就像电视里的芭蕾舞演员,在琴键上如此欢快地跳跃着。

有回我好奇地问同学,老师又会拉手风琴又会弹钢琴,她怎么什么都会?她似乎真的什么都会,因为五年级开学第一堂课她竟然教我们吹口琴,令我十分惊奇,以至于我立下志向,长大了要像她那样多才多艺,为此小学毕业后至今我没舍得扔掉那只上海牌口琴,尽管包装的纸壳子早已烂得不成样子。

之后我们接着跟她学唱了“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,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”,以及“我们的田野,美丽的田野,碧绿的河水,流过无边无际的稻田”等歌曲,这些歌曲曲调抒情委婉,歌词自然流畅,特别吸引我。六年级时校园里流行起了流行音乐,歌手们帅气、甜美的形象吸引了许多不同年龄的少男少女,我也曾沉浸其间,但我最爱的仍然是老师教的那几首歌。

七夕会

养育

